

# 在怀疑论和自然神论之间

## ——拉普拉斯对宗教的认识与反思

王幼军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作为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欧洲科学界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拉普拉斯的宗教观点是启蒙运动时期许多自然科学家对宗教认识的一个缩影。启蒙时代是一个对于人类理性充满了极度乐观的时期,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进步,一切非科学的知识终将让位于科学,过去一切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力量包括宗教也必将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此时宗教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在启蒙思想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拉普拉斯也秉承了这种特征,他一生都坚守着科学理性和科学决定论的信念,在他发表的著述和未发表的手稿中多有对于基督教的怀疑和批评之论。然而,与一般流行的观点不同,拉普拉斯并没有走向全面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之列,也没有走向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之伍,他的宗教观一直徘徊于怀疑论和自然神论之间。

**关键词:** 拉普拉斯; 宗教观; 科学观; 怀疑论; 自然神论

**DOI:**10.13806/j.cnki.issn 1008-7095.2018.01.009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De Laplace, 1749—1827)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一位成就斐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就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宗教信仰的关注和思考是贯穿其一生的焦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拉普拉斯的宗教观点存在误解,一方面,因为其广为人知的“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的宣称,许多人将拉普拉斯视为早期无神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另一方面,在基督宗教的宣传媒介中也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认为拉普拉斯在临终前已皈依了天主教信仰。这些简单化的观点均不完全与史实相符合,对于拉普拉斯的新近研究表明,拉普拉斯对宗教的认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就像他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一样,他对宗教的认识也显示出一条扑朔迷离、摇摆不定的状态轨迹。

本文将历史上对拉普拉斯有关宗教认识的记载进行汇聚分析,并对拉普拉斯的著作及其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中的观点进行考察,最后对拉普拉斯老年时期的言行进行评述,从整体上呈现拉普拉斯对宗教认识的状态轨迹及其与科学观之间的关系。

### 一、有关拉普拉斯宗教认识的记载

有关拉普拉斯早年宗教信仰的记载几乎是空白的,所有的传记都提到他的出身是一个难解的谜团,拉普拉斯生前对此讳莫如深,关于他的早年,能够确定的只是他的教育经历:拉普拉斯

收稿日期:2017-02-10

投稿网址:<http://shjx.cbpt.cnki.net>

基金项目:上海高峰高原计划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63)。

作者简介:王幼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生于法国卡昂(Caen)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6岁时(1755年)被送往当地的一所本笃会学校,家庭对他的最初期望是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神职人员。1765年,16岁的拉普拉斯离开本笃会学校,进入一所由耶稣会士创办和管理的学校,该校规定学生在取得神学学位之前,必须修习两年的自然哲学。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拉普拉斯的数学天赋开始显露出来。三年后,他决定投身于数学与科学事业,由此放弃了他自幼追求的宗教理想,在老师们的建议下,他动身前往能够助他实现理想的科学文化中心——巴黎,从此,拉普拉斯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科学事业中。<sup>①</sup>

拉普拉斯一生都保持着只对科学事务发表见解的习惯,他从未公开地发表过明确的宗教观点,他对于宗教的看法常常散见于一些与他有过交往接触之人的记载中,但这些记载往往掺杂着叙述者个人的主观理解和评论,其中的观点不尽一致甚至还彼此矛盾,这种状况是人们对于拉普拉斯的宗教观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例如,罗杰·哈恩在拉普拉斯的传记中有一个记载:“在一个宴会上,地质学家盖塔(Jean-Étienne Guettard, 1715—1786)被拉普拉斯大胆谴责上帝存在的言论惊诧得目瞪口呆。”在盖塔看来,拉普拉斯的无神论观点“是出于他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不是来自于他的科学宇宙观。”<sup>②</sup>在19世纪初与拉普拉斯有过交往的 chemist 杜马(Jean-Baptiste Dumas, 1800—1884)却说,拉普拉斯“向唯物主义者提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证,但他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sup>③</sup>罗杰·哈恩也认为,盖塔说法的可靠性颇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观点与拉普拉斯在宗教问题上一贯秉持的谨慎风格以及他在著述中所表达的观点大相径庭。

在有关拉普拉斯对宗教认识的记载中,人们更多地聚焦于他是否具有无神论倾向或者他是否相信上帝存在的问题。早在1800年,拉普拉斯的同事、天文学家拉朗德(Jérôme Lalande, 1732—1807)曾编辑出版过一部《无神论者辞典》,该书所列的条目中就有拉普拉斯的名字,其中还写道,在拉普拉斯的同事们看来,信仰上帝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表现,意味着蒙昧和迷信,宗教对于有理性的精英来说是不屑一顾的。<sup>④</sup>拉普拉斯本人对于入选该辞典的态度不得而知,但是罗杰·哈恩认为,这个辞典的严谨性和可信性令人怀疑,其内容是不严肃的甚至荒谬的,因为入选该书的无神论者中还包括拿破仑和耶稣。后来发生的事实也验证了哈恩的观点,就在同一时期,执政者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关于政府和教会关系的讨论接近尾声,这场争论的成果是1801年的宗教事务协约出台,拉普拉斯等人还被委以重任去说服一些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天文学家停止向公众宣扬无神论。

关于拉普拉斯的无神论倾向,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是他与拿破仑的一次会谈:在谈到拉普拉斯新近出版的著作《天体力学》时,拿破仑问道:“你写了这部关于世界体系的著作,但却没有提到它(宇宙)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反驳道:“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现代激进的无神论代表人物、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上帝并不伟大》<sup>⑤</sup>一书中特别津津乐道于这个例子,他将“我不需要那个假设”当作近代无神论者最精悍、最伟大、最自豪的宣言。然而,英国历史学家丹

① 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 “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8, Vol. 15, pp. 273—274.

② Roger Hahn,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Determined Scient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7.

③ Karl Alois Kneller, *Christianity and the Leaders of Modern Science: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by T. M. Kettle. London: B. Herder, 1911, pp. 73—74.

④ Pierre Sylvain Maréchal, *Dictionnaire des athées anciens et modernes*, ed., Joseph Jérôme Lalande, Paris, an8, 1800, pp. 231—232.

⑤ 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 *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 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USA/Warner Books, 2007.

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却认为<sup>⑥</sup>,拉普拉斯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但在政治上他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机会主义者,他堪称法国科学界的一位不倒翁,在当时跌宕起伏的法国政治环境中,无论世事怎样更迭变迁,他都享有历任执政者的眷顾,在旧制度、共和国、皇室复辟等无论哪个时期,他都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这得益于他随机应变及取悦当权者和民众的能力。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无神论尽管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潮,但仍然不是欧洲的主流思想体系,即使他有这种倾向,他也不会冒着失去其社会地位的风险公开地表达出来。

别有趣味的是,最权威的拉普拉斯研究者之一吉利斯皮(C. C. Gillispie)在其著名的拉普拉斯传记<sup>⑦</sup>中对这次会晤没有任何提及,或许他认为这个被演义得面目全非的故事不具有任何史实价值。拉普拉斯的另一传记作者罗杰·哈恩则明确表示:“在拉普拉斯的作品中没有一处否认过上帝的存在,无论是在公开发表的著述还是在未发表的手稿中。”<sup>⑧</sup>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拉普拉斯的条目也有类似的评论:出现在拉普拉斯私人信件中的表述与无神论者的观点相去甚远。<sup>⑨</sup>例如,拉普拉斯在1809年6月17日给他儿子的信中说:“我向上帝祷告,让他每日眷顾你,让他永存于你的心灵之中,正如也存在于你父母的心灵中一样。”<sup>⑩</sup>

那么,“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这句被希钦斯等人经常援引的、归于拉普拉斯之口的话究竟源自于何处?关于拉普拉斯与拿破仑会晤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至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F. W. Herschel, 1738—1822)。1802年8月8日,拉普拉斯正是在赫歇尔的陪伴下与拿破仑会晤的,赫歇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第一执政(拿破仑)随后问了几个与天文学和太空结构有关的问题,我给出了回答,看起来他对这些回答非常满意。他与拉普拉斯先生也谈论了这个问题,却与他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他与这位著名的数学家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是由第一执政的抱怨引起的,他以一种埋怨或许还有些欣赏的语气问道:‘谁是这一切的作者呢?’拉普拉斯先生的回答是:一系列自然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美妙系统的构造和维持,但第一执政却不认同这一点。关于这次争执或许可以谈论很多,通过两人的争论,我们转向了‘自然与自然的上帝’这个话题。”<sup>⑪</sup>

目前的资料显示,关于这次会晤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出现在安东马尔基的《拿破仑的最后时刻》中,但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拉普拉斯的名字:“在和L先生聊天时,我(拿破仑)祝贺他刚出版了一部新的著作,并问他,在他的著作中上帝的名称为什么没有出现过,而这个名称在拉格朗日的作品中被反复提及,他回答说他不需要那个假设。”<sup>⑫</sup>

时至19世纪80年代,曾经作为拉普拉斯在科学院的年轻同事、天文学家阿拉果(François Arago, 1786—1853)告诉天文学家费伊(Hervé Faye, 1814—1902),拉普拉斯与拿破仑之间的谈话被人篡改了,这个被篡改的版本在拉普拉斯去世前已广为流传。费伊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从阿拉果先生那里获得可靠的消息,拉普拉斯在去世前不久曾提醒说那个传闻即将发表在他的传记中,他已要求阿拉果告知出版商,或做出解释或删除它,而第二种方式是最容易的。然而不

⑥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culture-civilization/religion/the-hypothetical-atheist/>.

⑦ 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 *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Life in Exact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⑧ Roger Hahn,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Determined Scient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5.

⑨ Anon, “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sup>th</sup> edition, 1911, Vol. 16, p. 203.

⑩ *Euvres de Laplace*. Paris: Gauthier-Villars, 1878, Vol. I, pp. v—vi.

⑪ Constance A. Lubbock, *The Herschel Chroni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10.

⑫ *Mémoires du docteur F. Antommarchi, ou les derniers momens de Napoléon*, vol. 1, Paris: Barrois L’Ainé, 1825, p. 282.

幸的是,它既没有被删除,也没有被解释。”费伊声称,对拉普拉斯和拿破仑对话的描述越来越显示出“奇怪的变化”,他很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费伊认为,拉普拉斯的回答并非是将上帝的存在视为假设,他只是从决定论这一角度上来谈论上帝是否干涉自然规律的运行:“事实上,拉普拉斯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事情的本相是:牛顿相信在其理论中所论述的摄动最终会摧毁太阳系,声称上帝在某个地方不得不时时干预以防止这种糟糕的后果发生,并且上帝以某种方式维持着太阳系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牛顿而言,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这是保持我们所处世界的稳定状态的一个不完美的观点。当时的科学还不足以进步到把这些状态全部纳入一个完备的观点之中的程度。但是,拉普拉斯却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了这些状态条件。他本应如此回答第一执政:牛顿错误地求助于上帝的干预来不时地调整世界这台机器,而他拉普拉斯,并不需要“上帝对自然规律的干涉”这样一个假设。<sup>⑬</sup>

丹尼尔·约翰逊也认为<sup>⑭</sup>，“拉普拉斯从未说过这些归于他的话。”因为这次会晤的时间是在拿破仑加冕称帝(1804年12月2号)之前的1802年,当时他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所以拉普拉斯肯定不会称呼他为“陛下。”这个谬误是随着作家E. T. 贝尔(Eric Temple Bell, 1883—1960)的《数学精英》(1937年)<sup>⑮</sup>一书的流行而广泛流布的,但是《数学精英》的编纂风格及其内容的可靠性一直饱受历史学家们质疑。而拉普拉斯的同事阿拉果以及费伊的证词似乎又隐含了他的确说过这句话,但不是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而是关于上帝是否干预自然规律的问题。在1999年,史蒂芬·霍金也提出:“我不认为拉普拉斯是在声称上帝不存在,这只是意味着上帝不干预和不打破科学的规律。”<sup>⑯</sup>美国数学史家卡约里早在1893年的《数学简史》中就表述过类似的观点。<sup>⑰</sup>天文学家格拉斯(Ian S. Glass, 1939—)同样认为,从赫歇尔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拉普拉斯“显然是一位像赫歇尔一样的自然神论者”。<sup>⑱</sup>

## 二、拉普拉斯著述中的观点

如上所述,拉普拉斯在其天文学中明确表示他不需要一个干预自然规律和自然进程的上帝,但是,对于“他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一问题,众说纷纭的评论很难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这种模糊性也体现在拉普拉斯本人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他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明确地表述过自己的宗教观点,偶尔涉及的论述似乎更倾向于自然神论或者怀疑论的观点。

拉普拉斯在其流行甚广的《宇宙体系论》一书中曾以不认同的口吻评论牛顿的观点——“太阳、行星和彗星的这种美妙的安排,只能是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的创作。”<sup>⑲</sup>拉普拉斯则证明了行星奇妙的排列方式完全可以只借助于运动定律来解释,他借此消解了上帝对于自然的干预,但从“宇宙以稳定的规律秩序运转”这种决定论角度来说,宇宙必定是一个有计划设计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产物,拉普拉斯承认这个超越的设计者(上帝)的存在,并将他的一切观点和工作建立在这一信仰基础之上,他不认为这只是一个虚构的假说,只不过他将上帝世俗化为一

<sup>⑬</sup> Hervé Faye, *Sur l'origine du monde: théories cosmogoniqu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aris: Gauthier-Villars, 1884, pp. 109—111.

<sup>⑭</sup>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culture-civilization/religion/the-hypothetical-atheist/>.

<sup>⑮</sup> E. T. Bell, *Men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7. 中译本: E. T. 贝尔:《数学精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82页。

<sup>⑯</sup> Stephen Hawking, “Does God play Dice?” <http://www.hawking.org.uk/does-god-play-dice.html>.

<sup>⑰</sup> Florian Cajori,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893), reprinted by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1999, p. 262.

<sup>⑱</sup> Ian S. Glass, *Revolutionaries of the Cosmos: The Astrophysic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8.

<sup>⑲</sup> 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李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426页。

位万能的智慧者或人们所称的“拉普拉斯妖”(An Intelligence)。<sup>①</sup> 莱布尼茨曾批评牛顿求助于神的干预来调整和维持太阳系的秩序和平衡,他认为这种干预是对上帝智慧和能力的非常狭隘的想法。拉普拉斯非常赞同莱布尼茨的观点,他对牛顿竟然相信上帝干预自然的进程感到不可思议:“上帝把他的机器造得如此不完善,除非他用一些额外的方法去修正它,否则这个钟表很快就要停摆了”。<sup>②</sup>

拉普拉斯在其著名的《概率的哲学探究》中也有多处涉及宗教信仰问题,这些谨慎而隐晦的论述充斥着明显的怀疑色彩,例如,其中有一条关于复合事件的概率原理,这条原理的内容是:“由一系列事件组合而成的复合事件的概率是各个事件的概率之积。”<sup>③</sup>在阐释这条原理时,他特别强调:这个原理是概率论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利用它很容易解释谬误是如何形成的,这条原理意味着:即使在事件是相互独立的情况下,概率的乘积也会随着事件数目的增加而减少。拉普拉斯提醒读者:如果一个人缺乏这种知识,他就易于被误导和欺骗,只有遵守概率的数学逻辑,人们才能够意识到并进而避免一些习以为常的错觉。他通过类比的方式将这种认识延伸到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中,他认为,历史的证言是虚弱无力的,因为这些证言是一代代传递下来的,而每一次传递都会使得历史的可信度(概率)减少。由这种推理得出,距离人们如此之遥的代代相传的宗教故事的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

与公开发表著述的隐晦风格相比,拉普拉斯在从未发表的四篇手稿中所表达的观点更加清晰明确一些。<sup>④</sup> 这些手稿探讨的内容都是启蒙运动时期被人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是启蒙思想实践的组成部分。其中一篇手稿对新约《圣经》中记载的“奇迹”的真实性进行了讨论,他明确表示,类似于“圣餐变体论”这样的教义“与理性、经验、永恒的自然法则以及我们应该归属于至高智慧者的崇高理念相违背。”“宇宙的至高无上的立法者竟然能够使其所建立的、保持其稳定性的规律暂时失效”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因此必须“把超自然的奇迹作为不真实的加以拒绝”。

拉普拉斯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启蒙时代的烙印,他身处其中的智识氛围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于宗教的思考和看法。彼时法国科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热烈讨论感染了他,尤其是他的同事卡巴尼斯(P. J. G. Cabanis, 1757—1808)等人关于宗教、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因果关系等问题的争论,<sup>⑤</sup>唤醒了很久之前就萌生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体现在他的“论意志力”和“论因果关系”两篇手稿中。

拉普拉斯关于因果关系的思想承袭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观点,像休谟一样,他也认为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从前相继发生的事件中建立起来,为了建立因果关系,必须理清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因果关系的无知是导致迷信产生的因素之一。在对于人的行为以及导致行为的原因的探讨中,拉普拉斯认为,如果承认意志是人的行为的原因,那么,心理学的探索能够揭示出意志是如何指导行为的规律,心理科学的建立有助于进一步对宗教现象作出解释。拉普拉斯在手稿中阐释了宗教产生和流行的原因,他认为,宗教的形成是由于“意志和自由方面的虚假思想误导人类的心智”的结果。当推理不能为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时,

<sup>①</sup> P. S. Laplace,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Translated of the 5th French edition of 1825 with Notes by the Translator Andrew I. Dale, Springer-Verlag, 1995, p. 2.

<sup>②</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Simon\\_Lapla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Simon_Laplace).

<sup>③</sup> P. S. Laplace,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Translated of the 5th French edition of 1825 with Notes by the Translator Andrew I. Dale, Springer-Verlag, 1995, p. 7.

<sup>④</sup> P. S. Laplace, “Four Nonscientific Manuscripts”,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Determined Scientist*, edited by Roger Hah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15—232.

<sup>⑤</sup> Francois Magendie, “Quelques idées générales sur les phénomènes particuliers aux corps vivans”, *Bulletin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4, 1809, pp. 145—170.

人具有甘心接受神秘解释的倾向,像“圣餐变体论”等教义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如此令人深信不疑,正是人类不情愿接受自己有限性的典型表现。

作为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科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对于自然界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律坚信不疑,他说:“一切事件,即使是那些微不足道且表面上看来似乎不符合伟大的自然法则的事件,也都正如太阳的运转那样必然是自然法则的结果。”<sup>②⑤</sup>这种科学决定论不仅通行于无机的领域,而且也通行于生命的世界,拉普拉斯对于意志、心理等论题的热切探讨是其决定论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承认,宗教、意志等“人的领域”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至此,人们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虽然是非常欠缺的、不完善的,但是,他坚信这些领域存在着如同物理定律一样确定的规律,“道德科学”将使这些领域建立起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性。拉普拉斯的科学决定论思想是他对于概率论大力倡导的隐含驱动力,他反复表明,人类的心智对于达到终极真理是无能为力的,概率性的知识是人力所能及的最大希望,自然遵从规律,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从现象中推论出这些规律,从而预测与接近它们。他视之为使命的一个科学目标是:尽力使公众相信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知识,以替代多个世纪以来误导人们的错觉,这些错觉包括对超自然事件的发生笃信不疑。在《概率的哲学探究》中,他充满激情地论证了人们接受迷信的东西总是在对现象的精确原因未知之时,概率加强了他的宗教怀疑思想,这种观点多次隐晦地出现在他的《概率的哲学探究》等著述和手稿中。

### 三、老年时期的观点

虽然拉普拉斯早年放弃了成为一名教士的理想,而长期的科学生涯所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又助长了他的宗教怀疑精神,但他从未彻底摒弃宗教思考,对宗教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在老年时期,作为牛顿的信徒,拉普拉斯欲将自己与牛顿的一生进行比较,他开始探寻牛顿深层的精神世界,他尤其迫切寻求解答的问题是:牛顿为什么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版)中突兀地做出关于宗教信仰的宣称?<sup>②⑥</sup>是什么激起了牛顿如此坚定的信念——坚信上帝在宇宙的运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拉普拉斯想当然地认为,继《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17世纪80年代风靡世界之后,牛顿就陷入了疾病缠身的状况,疾病造成了牛顿的“精神错乱”。据罗杰·哈恩考证,为了确认这是牛顿的精神失常或精神错乱所致,拉普拉斯为此专门向英国的友人写信求证(据说是写给约翰·赫歇尔),并派人打听导致牛顿这种心智失常的原因,<sup>②⑦</sup>他难以想象,像牛顿这样冷静理性的科学伟人怎么可能将其毕生的追求虔诚地奉献给宗教信仰!尤其令他惊诧的是牛顿竟然将这种具有浓厚个人色彩的观点与他的科学工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思想公之于众,而拉普拉斯却一直竭力将他的个人情感从公共话语中分离出去。

在公开的场合,拉普拉斯一直保留着他的不可知论或者怀疑论的观点,他仍然对上帝在具有机械决定性质的宇宙中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他对同时代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抱有极大的好奇心,他经常与日内瓦的天文学家莫里斯(Jean F. T. Maurice)<sup>②⑧</sup>讨论基督教,作为虔诚教徒的莫里斯常常推荐一些文章给拉普拉斯看,例如,他推荐过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索尔兹伯里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 1643—1715)的“基督教真理性的证明方

<sup>②⑤</sup> P. S. Laplace,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Translated of the 5th French edition of 1825 with Notes by the Translator Andrew I. Dale, Springer-Verlag, 1995, p. 2.

<sup>②⑥</sup>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王克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615页。

<sup>②⑦⑧</sup> Roger Hahn,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Determined Scient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1, p. 202.

法”,并特别提醒他注意伯内特是如何为奇迹辩护的。但对于自然规律稳定性的坚定信念使拉普拉斯终究不能接受和相信超自然的事件和奇迹会发生,不过,莫里斯观察到拉普拉斯关于信仰的思想逐渐地发生了改变,他更愿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基督教,他认同基督教对于未开化之人的社会价值,尤其是赞同基督教信仰对于野蛮人的文明教化作用,拉普拉斯曾经这样回复莫里斯:“你知道基督教是一件相当美妙的东西……,这是与真正的文明相生相伴、使人们采用得体优雅的举止、并将人们转化为好学和自由守法公民的唯一宗教。”

上述记载出于莫里斯的题为“病中的拉普拉斯及其最后时刻”一文<sup>②</sup>,这段文字是莫里斯于拉普拉斯去世后不久写出的,其中他详细地记述了拉普拉斯病中以及临终前的情况。莫里斯试图把拉普拉斯描述为宗教皈依的候选者,他认为拉普拉斯正处于走向救赎的转变之中,他说:“拉普拉斯受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感觉好像很快就要宣称对信仰的真正渴求了。他在1827年2月肺部受到感染,于3月5日早上9点死于肺炎。在他患病的五周中,我定期去看望他,他让我靠近些,拉着我的手反复说‘不久我就会好起来,你要常来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多聊聊’。我不能把他赠予我的这份特殊友情归于任何原因,除了他内心深处分享幸福信仰的渴望,这是上帝早就赐予我的。在我看来,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他不厌其烦地向我表明这个倾向,然而,尽管我真诚地期待着,但没有能够与他展开更深入的谈话,他贤惠尽责的妻子从未离开他左右,因顾虑他的病痛和虚弱,她不允许如此。”

莫里斯在文中对于后来流行的拉普拉斯的临终遗言感到愤怒,这句遗言出现在两年后发表的傅里叶(Fourier, 1768—1830)的颂词中,傅里叶为了使拉普拉斯的形象更加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科学家形象,将他的临终遗言篡改为“我们所知的甚少,而我们未知的无限。”这句话与牛顿所说的一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处——“知识就像是未被发现的真理的海洋,而我就是在海边捡贝壳的一个孩子。”实际上,拉普拉斯的最后遗言是:“我们过去追求的都是幻影。”这是当时在场的拉普拉斯的学生泊松(S. D. Poisson, 1781—1840)告诉他的。罗杰·哈恩认为,莫里斯的记述尽管只是一个不能被证实的孤立证言,但看起来比傅里叶的颂词更加可信一些。莫里斯关于拉普拉斯的临终遗言的叙述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主观评论,例如他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对他而言是相当独特的,他似乎意识到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一切事情都是空虚的。”

拉普拉斯去世后,虔诚的拉普拉斯夫人请巴黎阿尔克依学院(Arcueil)的助祭和当地的一个福音布道团主持了葬礼仪式。当时一份天主教报纸(La Quotidienne)报道说拉普拉斯在两位教士的怀中去世,这意味着他已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了。然而罗杰·哈恩认为,这个报道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尽管迄今为止仍然缺乏其他的资料可以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但非常清楚的是,拉普拉斯去世前并没有天主教徒皈依的任何正式仪式,直到最后,他仍然是一位怀疑论者,坚守着他的决定论信条以及对于科学理性的坚定信念。<sup>③</sup>

#### 四、结 语

概而言之,拉普拉斯所经历的人生时段尤其是启蒙运动铸就了其宗教思想的底色。启蒙时代是一个对于人类理性充满了极度乐观的时期,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进步,一切非科学的知识必然让位于科学,过去一切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力量包括宗教必将经历一个去魅化的过程。此时宗教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最清楚地彰显这种

<sup>②</sup> Jean F. T. Maurice, “Illness and Last Moments of M. de Laplace”,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Determined Scientist*, edited by Roger Hah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33—234.

<sup>③</sup> Roger Hahn,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A Determined Scient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4.

启蒙特质的莫过于拉普拉斯在《概率的哲学探究》中那段著名的宣言：“一位万能的智慧者能够在给定的一瞬间理解使自然界生机盎然的全部自然力，而且能够理解构成自然的存在的每一种状态，如果这个智慧者广大无边到足以将所有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将宇宙中最巨大天体的运动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都包含在一个公式中。”<sup>①</sup>尽管人类的心智与这位广大无边的智慧者相距甚远，但牛顿等科学家们在数学和天文学的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拉普拉斯等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以无比的信心：通过对永恒规律的不懈探索并将之数学化，最终将会使得人类愈加接近真理。这种早期的科学主义思想也体现在他们对宗教的怀疑和评判之中。

拉普拉斯对宗教的认识秉承了启蒙时期对宗教的批判和怀疑特征，以现代观点视之，对于理性与科学进步的盲目崇信是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的一个主要缺陷，“它出于天真的过分自信，拿自己的标准作为评判宗教、历史等一切领域之绝对和唯一有效与可行的规范。”<sup>②</sup>然而，如果单纯地将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思想定性为“反对宗教”也未免流于肤浅，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基督教文化锻造出来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基督教文化在成熟时期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sup>③</sup>这种特点在拉普拉斯的思想中也彰明较著，尽管拉普拉斯在其著述中多有对基督教的质疑和批评之言，但是他并没有走向全面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极端，他对宗教的认识一直徘徊于怀疑论和自然神论之间。

## Between Skeptics and Deists

—Laplace's Views on Religion

WANG You-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scienc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Europe, Laplace's views on religion were typical of some natural scientists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The Enlightenment was a period of extreme optimism about human's reason. Intellectuals especially believ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s reason, all non-science would inevitably give way to science, and, all mysterious powers, including religious beliefs, would experience a process of demystification. At this time, religious skepticism and scientism were very popular. As Laplace grew up in the atmosphere of the Enlightenment, he upheld the features of Enlightenment. There were more questions and criticisms to Christian religion in his writings. However, Laplace neither was an atheist who totally denied God's existence, nor a religious believer. His views on religion had always been wavering between skepticism and deism.

**Key words:** Laplace; views on religion; views on science

(责任编辑 黄谷香)

<sup>①</sup> P. S. Laplace,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Translated of the 5th French edition of 1825 with Notes by the Translator Andrew I. Dale, Springer-Verlag, 1995, p. 2.

<sup>②</sup> E.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sup>③</sup>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陈常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